

中国城市研究
理论与方法
博士文库

博士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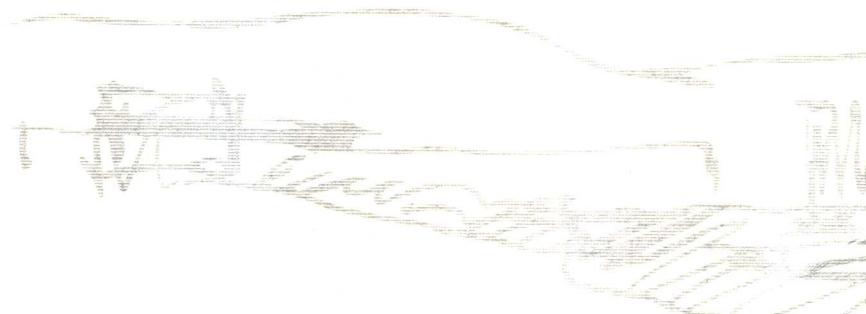
主编: 赵和生

著者: 张晓春

导师: 常青

东南大学出版社

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 ——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



中国城市规划·建筑学·园林景观博士文库

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

——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59878035)

著者 张 晓 春
导师 常 青
学科 建 筑 学
学校 同 济 大 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内容简介

近代上海，开埠和西方租界的设立，颠覆了原有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秩序，上海由一个传统市镇向近代化大都市迅速转型，并形成了中西合璧的都市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城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的中心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转移。城市中心的转移，反映出了不同文化群体，尤其是华、洋双方对上海城市空间主导权的竞争。上海解放后，行政统一的上海，城市空间的竞争演变为不同文化主题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控制，以及不同辖区之间的发展竞争。

本书试从都市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把上海的城市空间视为被不同文化分割和竞争的对象，将规划和建筑视作都市中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关注城市空间转换的过程，及其所折射的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

本书可供建筑、规划、城市建设等人员阅读，也可供城市文化研究人员及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 / 张晓春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8

（中国城市规划·建筑学·园林景观博士文库 / 赵和生主编）

ISBN 7-5641-0484-8

I. 文... II. 张... III. 城市规划—研究—上海市

IV. TU984.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9259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版人：宋增民

新华书店经销 兴化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2.75 字数：243千字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定价：29.00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读者服务部调换。电话：025-83792328）

主编的话

回顾我国 20 年来的发展历程,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全面实施,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就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而言,20 世纪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 31%。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 21 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我国城市化的背景大大不同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发展状况,所以,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将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即: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化过程而尚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之前,我们便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强劲冲击。因此,我国城市化将面临着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和第一、二、三产业同步发展、全面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所有这一切又都基于如下的背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健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带来了巨大冲击;脆弱的生态环境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存在着巨大矛盾;……无疑,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这一宏大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城镇体系、城市结构、空间形态、建筑风格等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及物质环境正悄然地发生着重大改变,这一切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并持续下去。当今城市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呼唤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我们必须在更高的层面上,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认真而理性地研究与城市发展相关的理论及其技术,并以此来指导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在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事业集聚起一支高质量的学术理论队伍,并把他们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展示给社会。由东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城市规划·建筑学·园林景观》博士文库,就是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该博士文库收录了城市规划、建筑学、园林景观及其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鼓励在读博士立足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前沿,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以理性的思维研究中国当今城市发展问题,为中国城市规划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理论基础。该博士文库的收录标准是: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鼓励理论研究贴近现实热点问题。

作为博士文库的最先阅读者,我怀着钦佩的心情阅读每一本论文,从字里行间我能够读出著者写作的艰辛和锲而不舍的毅力,导师深厚的学术修养和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严谨治学的风格和精神。当把这一本本充满智慧的论文奉献给读者时,我真挚地希望每一位读者在阅读时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热切关注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可以预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引爆”与“集聚”,这套丛书将以愈加开阔多元的理论视角、更为丰富扎实的理论积淀、更为深厚真切的人文关怀而越来越清晰地存留于世人的视野之中。

赵和生

目 录

1 导论	(1)
1.1 上海近现代文化竞争和空间变迁研究	(1)
1.1.1 研究的目的	(1)
1.1.2 研究的基础;前人对上海的相关研究	(2)
1.2 都市变迁的空间意涵:一个都市人类学的视角	(5)
1.2.1 关于文化的移入及适应	(5)
1.2.2 关于都市人类学方法	(7)
1.2.3 都市空间与社会文化意涵	(10)
1.3 上海都市空间的文化竞争和中心转移	(11)
1.3.1 殖民城市与后殖民理论范式	(11)
1.3.2 近代上海:分割的都市空间与被争夺的都市空间	(14)
1.3.3 上海都市的文化竞争与空间场景转换	(15)
2 华界中心——老城厢:豫园、城隍庙地段演化的历史场景分析 ..	(19)
2.1 五方杂处的老城厢	(19)
2.1.1 上海县城的传统风貌	(19)
2.1.2 五方杂处与文化上的灵活多元	(22)
2.1.3 从县城到老城厢	(24)
2.2 “场所精神”:老上海的庙园节场	(24)
2.2.1 发展沿革简述	(25)
2.2.2 老上海的庙园节场	(28)
2.2.3 场所精神:传统宗教和风土乡俗	(34)
2.3 角色转变:从风土乡俗到“海派”市井	(36)
2.3.1 开埠前:庙市的形成及其城市化	(36)
2.3.2 开埠后:市井生活的场所	(40)
3 租界中心——外滩地段:都市空间竞夺的历史场景分析	(44)
3.1 “外滩源”:新教文化与“摩登”空间	(46)
3.2 外滩的双重含义	(50)

3.2.1	“外滩”地名的由来	(50)
3.2.2	从“无意识、无差异”的移植到“有意识、多元化”的选择 ——外滩建筑形式风格演变	(51)
3.2.3	外滩的双重含义	(57)
3.3	租界内外的空间竞夺	(70)
3.3.1	外滩建筑群中的特殊竞争	(70)
3.3.2	租界——县城(老城厢);两种不同的城市场景和生活形态 ..	(75)
3.3.3	空间的竞夺与文化的变迁	(80)
3.4	租界空间的文化差异	(98)
4	华界新中心——江湾五角场:市政空间转移与中国文化复兴 ..	(103)
4.1	抗战前后的几项都市计划(1927~1949 年)	(103)
4.1.1	《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和《大上海计划》	(103)
4.1.2	日占时期的《上海新都市建设计划》	(109)
4.1.3	抗战胜利后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113)
4.2	“中国复兴”的都市心态与空间形态	(115)
4.2.1	国民政府《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和《大上海计划》的主要意图与 新市政中心的选址	(117)
4.2.2	规划道路与命名	(119)
4.2.3	都市空间与建筑的“中国复兴”	(121)
4.3	意义和局限	(127)
4.3.1	《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和《大上海计划》的矛盾性	(128)
4.3.2	《大上海都市计划》	(131)
4.3.3	梦中的“中国复兴”	(135)
5	回返上海近代历史中心:当代语境中的都市空间遗产与文化竞争 (137)	
5.1	从跑马场到市政文化中心;人民广场的场景转换	(139)
5.1.1	昔日娱乐中心;租界中的跑马场	(140)
5.1.2	“城市的客厅”;新型市政文化中心	(142)
5.1.3	历史场景转换的文化内因	(147)
5.2	“两岸三角”的中心格局与历史空间的文脉窘境	(149)
5.2.1	外滩空间意涵的重新建构	(151)
5.2.2	浦东;新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154)

5.3.3 都市历史空间的文脉窘境;以城隍庙、豫园为例	(157)
5.3 后殖民语境中的都市空间走势与跨国界的文化竞争 ...	(166)
6 结语：谁的文化——上海都市中心的转移与都市主导文化及空间的 变迁	(173)
6.1 文化竞争与都市空间的变迁	(173)
6.2 上海的文化竞争与上海的现代性特征	(174)
6.3 上海近现代都市中心的流变是文化竞争在建成环境上的直接 表达	(175)
6.4 后殖民语境中的上海都市空间遗产	(176)
参考文献	(177)
图片索引	(186)
后记	(192)

1 导论

1.1 上海近现代文化竞争和空间变迁研究

1.1.1 研究的目的

近代上海,是一个带有强烈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印记的大都市,中国其他地区与西方不同国家迁入上海的移民共同构成了上海多民族、多文化的都市特征,甚至行政归属权也处于清政府(以及其后的国民政府)和租界的权力争夺与制衡之中。这些互相冲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等,都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不同的势力与阶层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阐释或涂抹上海的城市空间。

而上海的城市格局和文化变迁,也隐含着对“上海”两字的定义和理解的变化和发展,“‘上海’是个内涵不断变化的名词”^①。在不同历史时期,“上海”所指不同,例如开埠前上海县城所代表的“上海”,以及开埠后同时含租界和老城厢的“上海”;同一时段历史内的“上海”所指也有不同,例如华界代表的“上海”和租界代表的“上海”。不同的“上海”,有着特定的城市景观与之对应。豫园、城隍庙是开埠前行政统一的上海县城的象征;随着租界的发展,外滩、南京路成为租界乃至经济已十分繁荣的大上海的象征;而法国梧桐、幽美的霞飞路则成了上海异国情调的注释。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究竟谁主导着上海城市形态的发展?谁的城市空间主宰着上海的话语权?谁的空间形象代表了上海?在特定的历史沉浮中,哪里才是上海城市的重心所在?反之,上海不断翻新、变动不居的城市空间格局,又如何帮助建构了不同城市居住主体的亚文化,并最终建构了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

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梳理近现代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正是本书所关注的核心。而即将展开的论述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所提供的多元视角和相当宝贵的资料的基础上的。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总序.7

1.1.2 研究的基础:前人对上海的相关研究

上海研究,一直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热点。近几年,随着上海经济的腾飞,上海更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在浩繁的上海研究中,既有对上海城市发展历史的通论性研究,也有关注于上海城市历史中的局部或典型问题的专门史研究。而有关上海的史料集、回忆录、大事记、图片集和各种典故集等,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研究中,相当一部分致力于探究上海在近代百年间经历的独特发展过程,内容涉及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生活习惯、金融经贸、都市空间、城市面貌、人口问题、都市移民、市民心理、同乡组织、宗教问题、工人运动和文学艺术等。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研究都从多种不同角度强调了上海的“都市变迁”,及其变迁过程中华洋之间跨文化的碰撞、理解和多种矛盾的并存。

唐振常、沈恒春先生著之《上海史》(1991)、张仲礼先生主编之《上海近代城市研究》(1990),熊月之先生主编的15卷的《上海通史》(1999)等通论性著作,在介绍了上海的成城过程基础上,重点以1840~1949年之间的近代上海为对象,详细研究了上海开埠后,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不仅交代了近代上海在工商业上的成就,近代都市市政管理上的近代化;还特别指出上海在社会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生活娱乐方式、新的职业群体、近代市民群体、市民意识、市民文化,以及新的世界观念。

在专门史的研究中,上海独特的“租界现象”无疑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上海租界志》(2001)以史志的形式历数上海租界的产生、发展和收回的过程,详细地阐述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基本制度和行政管理。上海史料丛刊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蒯世勋、徐公肃等著,1980)偏重于对公共租界的发展、制度的法理分析。梅朋、傅立德著《上海法租界史》(1983中文版)对法租界的形成、发展和组织特点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此外,由于租界存在而产生的独特的城市格局,华洋之间、乃至多元文化的对立与交融,租界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对上海政治、经济、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深刻作用,也被学者从多种视角切入反复研究。

在《百年上海城》(1999)一书中,郑祖安先生就曾对近代上海的“三界四方、浦东浦西的分割都市”^① 的状况进行分析。他指出,上海城市的割裂

^① 郑祖安.百年上海城.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前言.3

状态包含两个层次的分割,第一层次是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形成的三界对立;第二层次是华界内部的分割,即闸北新区与南市、老城厢之间被租界分割,以及地理环境造成的浦西和浦东的分割。这两个层次的分制造成了上海在城市规划、市政管理、都市面貌上的混乱和差异^①。然而,这种特殊的城市格局却在另一方面激发了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城市生活的变迁。熊月之先生指出:“晚清上海一市三治,既存在着政治控制、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也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②新型世界观念、民主观念、市政管理和市民意识、民族意识的萌芽,均是在与西方物质文明和体制的碰撞与交融中形成的^③。忻平认为,在上海走向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上海在人文地理上形成了租界与华界的“多元势差格局……一切都是割裂的,一切都是重叠复合、多元异质的,……从根本上制约与规定了上海现代化区域格局与生活方式的差异。”^④乐正对1860~1910年间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变迁的研究,也是在上海华界与租界并置的“双轨制”社会背景中展开的^⑤。卢汉超在《霓虹光影之外——20世纪初的日常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99)一书中,描述了20世纪初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生活方式自然共存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尤其关注于生活在现代“霓虹光影之外”的上海“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强调了上海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某种意义上的两面性。叶凯蒂(Catherine V. Yeh)则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外不同势力绘制的近代上海地图的研究,表达了由此反映出的不同势力对上海城市空间的理解、争夺和定义,以及地图形状的变化所隐含的上海城市的发展方向^⑥。

关于上海近现代城市建设与建筑文化的研究,同样也是既包含对上海近代建筑风格演变发展的整体研究,如《上海近代建筑史稿》(陈从周、章明主编,1988)、《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王绍周,1989)、《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伍江,1997)、《上海近代建筑风格》(郑时龄,1999)等。也有

① 参见,郑祖安.百年上海城.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46—247

② 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见: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3

③ 参见,熊月之.上海租界与上海社会思想变迁.上海研究论丛(2).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在《上海近代城市研究》、《上海通史》等著作中都有论述。

④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3

⑤ 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⑥ 参见:[德]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对上海近代营造业、建筑施工的技术发展史研究,如《上海建筑施工志》(吴文达主编,1997)、《上海近代营造业的形成及特征》(何重建,1991)等。以及各种对具体的建筑空间类型的单项研究,内容涉及里弄建筑研究、教堂建筑研究(路秉杰,1986),上海的街道空间和上海园林研究等^①。此外,关于近代上海建筑制度和市政建设的演变^②,近现代上海的华人和外国建筑师研究^③,以及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上海近代房地产业的发展研究,也不乏佳作。例如,张鹏在其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以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尤其关注市政控制和市政设施两个方面对上海近代都市形态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④;最近几年,上海的城市建设速度惊人,新建筑对旧有城市面貌的破坏令人担忧,因而,对上海的历史保护区域的调查研究和改造日益得到广泛重视。例如罗小未先生主持的两项保护研究课题,上海新天地周边区域的历史人文、建筑考察和老虹口北部的保护和更新研究^⑤;郑时龄先生主持的上海多伦路的改造;莫天伟先生主持的上海思南路的改造;常青教授主持的上海“外滩源”^⑥和南京路外滩段^⑦的建筑历史场景考察,上海东外滩、江湾地区的建筑历史考察等。上海特殊的城市历史人文环境对上海城市建筑空间的深刻影响,是上述研究中的共识。

近代上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公共性研究,是试图解读上海近代化过程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视角。例如对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拓展的研究(熊月之,1998);方平从报刊传媒、公众舆论、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公共空间的聚会活动等方面入手,试图探究晚清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社会变迁的关系^⑧。日本学者小浜正子则从社会网络、社团组织、地方自治和政党国家统治下的社会重组等内容,研究上海近代地域社会的结构和公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上海园林志》编委会编.上海园林志.2000;朱宇晖.博士论文.上海传统园林研究.2003;在孙杰著《古代上海艺术》(2000)中也有对上海园林艺术的分析

② 参见赖德霖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第一部分从上海公共租界看中国近代建筑制度的形成,1992

③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伍江的两篇文章,旧上海的外籍建筑师和旧上海的华人建筑师,分别载于《时代建筑》1995.4 和《时代建筑》1996.1;以及华震虹的关于邬达克的硕士论文

④ 参见张鹏的博士论文《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上海公共租界都市空间与市政建设变迁研究》,2005年同济大学

⑤ 参见:罗小未主编.上海新天地——旧区改造的建筑人文历史与开发模式的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罗小未主编.上海老虹口北部昨天·今天·明天——保护、更新与发展规划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

⑥ 参见:常青编著.建筑遗产的生存策略——保护与利用实验.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

⑦ 参见:常青主编.大都会从这里开始——上海南京路外滩段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⑧ 参见:方平.清季上海的公共领域与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

共性特点^①。

还有学者从文学、电影角度进行上海都市现代性研究^②；从上海道台——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起到的沟通中外政策和文化差异的作用的角度，研究并展现了上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③……

甚至出现了“上海学”的提法，在熊月之和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④一书中，暂且搁置对“上海学”一词的争议，而把海外关于上海的研究、多种著作和研究名家进行了梳理。

上海城市历史的研究，内涵丰富、内容广泛、角度各异。若想将关于上海的各种研究成果“一网打尽”，几乎是不可能的，上述文献也只是众多上海研究中的九牛一毛。

1.2 都市变迁的空间意涵：一个都市人类学的视角

1.2.1 关于文化的移入及适应

社会文化的变迁向来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关注，人类学视野中的变迁既包括原有社会文化体系内部自然发生的变化，也包括在外来社会文化体系冲击下而导致的原有社会文化体系的改变。当试图对文化变迁的途径、过程和结果作分析和解释时，人类学经常使用如下三个概念：传播(Diffusion)、文化丧失(Culture loss)和涵化(Acculturation)^⑤。

其中，涵化现象备受关注。英文辞典中将“Acculturation”解释为“文化适应，同化过程(原始文化与发达社会接触后发生的变化)”^⑥，因而不论将其译为“涵化”或者“文化潜移”^⑦，都可知其中包含了文化的移入与适应两个过程，故本书使用文化移入及适应的说法。王铭铭根据前人的研究，将文化移入及适应过程可能出现的结果总结如下：①取代(Substitution)，即

① 参见：[日]小浜正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② 参见：Yingjin Zhang.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③ 梁元生著；陈同译.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④ 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⑤ 参见：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7

⑥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辞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3

⑦ 参见：[美]罗伯特·F.墨菲著；王卓君，吕迺基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56

以前存在的综合体由另一种综合体所取代,产生最小的结构改变;②综摄(Syncretism),即各种旧物质混合形成一种新制度,这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文化变迁;③增添(Addition),即增添新的物质或物质综合体,有时会发生结构改变,但有时也不会;④萎缩(Deculturation),即丧失一个文化的实质部分;⑤起源(Origination),即产生新的物质来满足变化形势中的需求;⑥抗拒(Reaction),即变迁过程十分迅速,以至于许多人不能接受这种变迁,其结果会造成抗拒、反抗或复兴运动^①。事实上,上述总结过于抽象,由文化移入及适应造成的原有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异,通常会表现为上述几种结果的混合。

文化移入及适应现象首先源自于两种或以上的文化发生直接和连续的接触,因不同文化的接触十分普遍,这种现象也就非常广泛。但其更显著的特点,则如罗伯特·F.墨菲所说:“文化潜移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是,由于政治上具有优势的群体的竞争,实用主义动机,以及某些时候由于胁迫,所造成的大范围的传播。”^②故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文化移入及适应现象,恐怕是发生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非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当中。与西方殖民者的军事征服、经济控制与资源掠夺相伴随的,是西方文化的强行传播。非西方社会的社会文化体系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体系的强大冲击,并进而发生了剧烈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非西方社会的原住民在这个过程中也部分地吸收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例如,现代的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服饰就体现了16世纪西班牙的服饰特点^③。即使今天,文化移入及适应现象仍然存在,遍布世界各地的麦当劳餐厅、乡村的都市化、高科技的蔓延都可以证明。

文化移入和适应现象在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尤以上海最为突出。为英国武力所迫而开埠、设立通商口岸的上海,却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一跃而成为国际大都市,并成为联结中西方文化的一个纽带。上海被认为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然而,上海的“西化”并没有改变其中国城市的本质。上海的文化中的“西化”烙印正是源自于上海曾经吸收了起初被强加的西方文化,并逐渐将之融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在租界存在的近百年当中,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习惯、文娱方式等实际已日益融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明确地讲,正是这种融合

①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8

② [美]罗伯特·F.墨菲著;王卓君,吕迺基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56-257

③ 参见:[美]罗伯特·F.墨菲著;王卓君,吕迺基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57

的过程,这种文化的转移,抑或是叫做‘语言转换的实践’(借用玛丽普莱特的术语),才产生了以上海这个城市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的模式”^①。

1.2.2 关于都市人类学方法

传统研究中将城市视为“物质实体的有机整体”的观念也越来越受到新的研究观点的挑战。事实上,简单的“城市”这一归类的方式和界定概念的基础也开始动摇。虽然不同的学科都在研究“城市”,或许它们关于城市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一个不容否认的趋势在城市研究中日益明显,也就是不同学科对于城市的不同认识之间相互的渗透和影响,使我们无法简单地定义某种城市研究究竟是哪个学科领域专属的方法,也造成了许多新兴交叉学科的出现,这些也不断地丰富着城市研究的内涵。其中都市人类学成为对本书研究有重要意义的视角。

在塞塔·娄(Setha M. Low)编辑的一本反映都市人类学较新研究成果的著作《理论城市——新都市人类学读本》中,对都市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不同范式作了清晰明了的展示:都市人类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符号,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②。作者提倡的是“都市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ity),而非“都市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the City)^③。也就是说不局限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都市中的延伸,同时也从宏观上用人类学的视角和观点进行城市研究。将城市的宏观演进过程(Macro Processes)与城市细微的肌理组织、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看。都市人类学的第一种范式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或一种都市生态学的影响,将城市看作一种被人所占据的功能区域,以一种同心圆的模式向外延伸,比如90年代一些对芝加哥黑人区的研究;对都市人类学第二种范式的重要影响来自于社区研究,比如对英国伦敦等地住宅拆除重建规划过程中进行的关于都市社会网络的研究,这种研究将城市视做由一系列的都市社区(Urban Communities)所组成,基于一种对家庭和亲属关系网络的延展;第三种研究范式是诸如对拉丁美洲低收入居住区规划和建筑的研究,以及对像巴西利亚这样的城市和建筑规划设计中,

① [美]顾德曼著;袁燕译.上海与近代中国的多元性.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15

② 参见:Setha M. Low(ed.), *Theorizing the City: The New Urban Anthropology Read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9.2-5

③ 参见:Setha M. Low(ed.), *Theorizing the City: The New Urban Anthropology Read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9.2

地方国家国际三个不同层面上规划目标的冲突,将规划和建筑视作都市中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分析这一专业的权力/知识结构;第四种研究范式是对超地方(Supralocal)和地方之间的关联以及国族(Nation / State)分析,诸如研究中心地与周围广大郊区或乡村地区之间物品、货币、劳动力和服务的流动等。最重要的理论转折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视点,在对美国都市的长期研究中占主导的社会组织论的范式逐步为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所取代,分析工业资本在都市变迁中所起的实质作用,用不平等、异化、疏离等概念分析城市社会问题。90年代起,一些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认为,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只能真实地记录或描绘新奇的材料却对理论的建构帮助不大,因此一种激进的民族志研究应当将日常生活体验与改变城市的结构性变迁过程联系起来,如雅各布斯(J. Jacobs)在1993年的文章中提出的“再现的城市”(Representational Cities),开始着眼于将都市环境视作一种被编码的文本而加以解读。从而城市研究的都市人类学也开始了一种理论论证或推论的模式(Discursive Models)^①,如霍斯顿(J. Holston)对巴西利亚城市和建筑进行的分析^②,将巴西利亚作为一种反映想象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再现文本进行解读。

再来看整个人类学的学科领域受到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的领域,深受两股潮流的影响:70年代提出的殖民主义和世界体系的理论,强调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宏观体系中理解历史和西方中心文化观的兴起;比这种思潮稍晚,在人文学科领域对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批评性研究也开始兴起。这二者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家的思想方式^③。人类学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一种平面式的民族志的描述,似乎是中性和客观的。事实上,人类学家开始反思人类学所运用的表述和话语中隐含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对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学术和政治经济体系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王铭铭所指出:“80年代以来,社会人类学对文化研究中隐含着的历史想象的反思,逐步推动了三种类型的研究的发展:第一种,是至今影响仍然十分巨大

^① 参见:Jacobs, J.“The City Unbou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the city”, in Urban Studies 30 转引自Setha M. Low (ed.), Theorizing the City: The New Urban Anthropology Read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参见:Holston J. The Modernist City: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Brasil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转引自 Setha M. Low(ed.). Theorizing the City: The New Urban Anthropology Read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参见: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2-13

的对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及民族中心的权力主义和主流话语的直接结构；第二种，是在传统研究及叙述风格范围内展开的对于历史话语和叙述(Narratives)本质的思考；第三种，则是对于如何在学术文本中认可、展示、强化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范围之外的‘其他声音’(Other Voices)这个问题的探讨。”^①

人类学整个学科领域所面临的以上挑战和研究范式的变化，同样反映在城市研究，即都市人类学的学科范畴内。后殖民主义的理论(Postcolonial Theories)事实上提供了一种讨论城市的视角，尤其是东方城市中，可以在城市的建成环境(城市空间与建筑)、殖民历史与文化想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身份认同与全球的都市进程之间建立批判性联系的范式。亚洲学者开始应对这样的问题，并从殖民历史对当代亚洲城市的影响这样的分析角度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研究。在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中，或许在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文化身份成为投射在城市建成环境上的主导性要素。当然，这样的投射和控制，往往通过必要的权力技术过程(如市政规划和建筑设计等)得以实现。而在这种制度和权力控制的缝隙中，日常生活的实践，尤其是来自被压抑和控制的群体的生活实践，与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秩序进行着抗争，最终达成一种代表不同身份和背景的声音在都市过程中的对抗平衡。例如布兰达·叶(Brenda Yeoh)的《竞争的空间：殖民新加坡的权力关系与都市建成环境》分析了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希望城市被秩序化、卫生良好并受到各项法规的严格控制，由此与当地亚洲社区的居民自身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从而指出新加坡的城市建成环境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代表不同势力和团体的价值冲突之间张力平衡及协商妥协的结果^②。而库斯诺(Abidin Kusno)的博士论文《追寻后殖民：印度尼西亚的建筑、城市空间与政治文化》则在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中探讨了从荷兰殖民地的命运中挣脱出来的印尼的新政权如何试图通过对建筑形式、城市空间的塑造来重写印尼的历史，创造一种“新秩序”，以寻求后殖民的文化身份体认^③。而大量的文献也分析研究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城市化与自身文

① 参见：王铭铭.逝去的繁荣——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3

② Brenda S.A.Yeoh. *Contesting Spac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ingapo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Abidin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Architecture, Urban Space and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